

·文献学苑·

#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与缺失

赵良宇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明代学者在文献考据学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 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 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 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 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者还有好奇博杂、引用材料时不注所出、妄删引文、论证疏漏讹误等一些弊病。

关键词: 明代 考据学 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2-0111-05

## The Achievemen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in Ming Dynasty

Zhao Liangyu ( History Culture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text expatiat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Ming Dynasty and its imperfection. The text points out that those scholars' academic criticism to the hollow academic atmosphere of has the spirit of pursuing the truth; And they emphasize reading and testifying widely; they make a point of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criticism so that the academic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could become mature gradually. The text still emphasizes that those scholar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still have some limitations. Their study is sort of curious and miscellaneous. They quote the material and give no chapter and verse for it. Sometimes they delete the quotation to meet their own demand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textual research; achievement

CLC number: K207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2-0111-05

明代中后期一批古代文献考据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肆力古学, 不断扩大文献研究范围, 进一步开拓文献研究领域, 在音韵训诂、古史、名物典制, 甚至戏曲、小说的考据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此文献考据风气者, 是明中期考据学者杨慎、王世贞、梅鹗、胡应麟、陈耀文等。明代后期则有焦竑、陈第、周婴、方以智等人。考据学复兴, 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明代考据学直接开启了清代考据求实的学风, 为清代考据学的鼎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对后世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明代考据学的研究, 前人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 如嵇文甫先生在其著作《晚明思想史论》中的《古学复兴的曙光》<sup>[1]</sup>一章, 对明代主要的考据学者及其考据学成果进行了初步地分析和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关于明代考据学的研究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著有《明代考据学研究》<sup>[2]</sup>, 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明代考据学产生的背景、条件、原因, 并逐一介绍了明中叶以后八位考据学家的学术主张、考据所采用的方法、取得的成绩等。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sup>[3]</sup>中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历史, 其中从文献学角度论及了明代考据学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更多的学者则侧重于明代考据学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研究。如刘毓庆先生在其著作《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sup>[4]</sup>中对明代诗经考据学深入地进行了阐述。杨绪敏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辨伪学史》<sup>[5]</sup>中对明代考据辨伪的成就和思想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刘起钎先生《尚书学史》<sup>[6]</sup>中总结了明代学者梅鹗关于伪《古文尚书》的考据成就。钱茂伟先生在《明代史学的历程》<sup>[7]</sup>中分析和论述了明代史学考据风气的

兴起以及杨慎、王世贞、胡应麟、张遂、朱明镐等学者的史学考据成就。还有一些关于明代考据学者的评传和单篇论文。

总的来说,明代考据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缺乏从宏观上作全面的研究和总结。本文旨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考据学的成就及其缺失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与研究。

## 一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

### (一) 批判明代的空疏学风

明代考据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不囿于前人旧说,敢于怀疑和批判,体现出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对明代空疏学风的批判,倡导求真求实之考据精神是明代考据学学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对于明人学术之空疏的弊病,杨慎还有更多的揭露和批判。他曾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sup>[8]</sup>他还说:“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sup>[9]</sup>在这里,他强调舍传注疏释而空谈义理“是无椽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sup>[10]</sup>针对宋儒废汉儒而用己见的做法,他主张用“训诂章句”的办法来“求朱子以前六经”<sup>[11]</sup>以使六经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对于其他考据学者的考据学术研究无疑起到推动作用。

焦竑对于学术界不读书的空疏学风也是极为不满。他曾说:“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sup>[12]</sup>他强调为学要注重对经典的研究,而不能舍弃经典,这对于学术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盖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谬。此如法不稟宪令,术不本轩、歧,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sup>[13]</sup>

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总明代中后期求实考据思想之大成。他对于王学末流糟粕六经、空言心性的虚妄之风,给予了猛烈地抨击。他说:“慈湖因象山谓‘六经注我’而遂以文行忠信非圣人之书,则执一矣。……执此而禁人《诗》、《书》,则《六经》必贱而不尊,《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今皆以扫除是道,市井油嘴皆得以鄙薄敦《诗》、《书》,悦《礼》、

《乐》之士,为可伤叹,故不得已而破其偏。”<sup>[14]</sup>

杨慎、焦竑、方以智等人对理学特别是心学末流抛弃汉唐注疏、脱离经典本义或抛开经典而空谈心性加以批判与谴责,主张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复兴古学。这极大地推动了明代求实考据之学的发展。

### (二) 批驳和厘定前贤考据成果之讹误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还表现在,明代考据学者对考据学成果讹误之处加以批驳和纠正。明代考据学者大都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是一味的盲从,而是勇于怀疑,敢于批判。这是明代考据求实之学能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明代学术生命力之体现。

杨慎是开有明一代考据学风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丰富,考据成果极其丰富,对后世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学者对其学问很推崇,但是杨慎的考辨也存在许多偏激与失误。他曾经流放地处僻壤的云南永昌,由于文献难求,所带书籍不多,他的著作征引文献,难免出现错漏之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指出“……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诸书,不免瑕瑜并见,真伪互陈。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sup>[15]</sup>故后来纠正其误的学者甚多。周亮工曾说:“杨用修先生《丹铅录》出,而陈晦伯(耀文)《正杨》继之,胡元瑞(应麟)《笔丛》又继之,时人颜曰:正正杨。当时如周方叔(婴)、谢在杭(肇淛)、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sup>[16]</sup>在杨慎之后,陈耀文、王世贞、焦竑、胡应麟、周婴、方以智等人对其考据成果进行了辩驳和纠谬,推动了明代考据求实之学的形成和发展。

如陈耀文作《正杨》,“凡一百五十条,皆纠杨慎之讹”,“考正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sup>[17]</sup>他在《正杨》中对杨慎在考证过程中的引文之误、引事之误、论证之误加以驳正。对于杨慎考辨有所疑问但无法判定其是非,陈耀文则引用相关资料,存杨慎说之疑,待后人进一步考证。另外对杨慎论证不足的,陈耀文则详为补充。虽然他的态度有点过于刻薄,但对于建立严谨的考据学风,贡献极大。

胡应麟也曾指出杨慎考证的缺点,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敝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早岁成滇,罕携载籍,絀诸腹笥,千虑而一失,势则宜然。”<sup>[18]</sup>《少室山房笔丛》中有《丹铅新录》八卷,全是为批驳杨慎错误而作的。还有《艺林学山》八卷,也有大量订正杨慎考证之误的内容。胡应麟对杨慎的疏漏之处加

以辨驳,范围更广,如有纠杨慎引文不注所出、纠杨慎引书名或人名之误、驳杨慎之讥刺朱子、驳杨慎论证之误等诸多方面。此外,对陈耀文《正杨》的不足之处,胡应麟也注意进行补正。<sup>[19]</sup>

周婴对明代诸多考据学者的一些考辨讹误也注重纠驳。在其著作《卮林》中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谗胡》等诸篇,分别批驳了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竑、胡应麟等学者考辨的讹误。他尤为注意对胡应麟的纠驳,《卮林》卷八纠《玉壶遐览》、《九流绪论》、《诗薮》、《史书佔毕》等书;卷九纠驳《二酉缀遗》、《九流绪论》、《诗薮》、《庄岳委谈》、《甲乙剩言》等书;卷十纠驳《史书佔毕》等书。其对胡应麟考辨错误的订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纠胡应麟考人物之误、二是纠胡应麟考地名之误。<sup>[20]</sup>

此外,方以智在《通雅》中对杨慎等明代考据学者考辨的错误也有诸多辩驳。这对于建立严谨的考据求实学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三) 追求考据研究的博学与博证

明代考据学者反对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的学风,都主张广闻博学多识。如杨慎就是一位博学的考据学者。他勤奋好学,利用各种有利时机阅读大量文献书籍。他对于上至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无所不究。《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sup>[21]</sup>他明确提倡博学之风,“先辈读书博且精,不似后生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sup>[22]</sup>杨慎在学术实践中,力行其提倡的博学宗旨。清人对之评价亦颇高:“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疏舛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求之于古,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在明三百年间,固铁铮铮者矣”。<sup>[23]</sup>他以广博的学识、扎实的学术工作、繁富的学术成果,推动了明代求实考据学风的发展演变。

焦竑的考据著作大都能体现其广博的特点,他的学术笔记《焦氏笔乘》正续集所考据的学术范围包括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的经学、史学、哲学、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许多方面,表现了其学术博洽淹通。与时人的肆意炫耀夸博不同,焦竑的治学是博而精审,“义例精而权重审,闻见博而取舍严”。<sup>[24]</sup>其中焦竑的“闻见博”主要是得之于他的勤于搜辑。

明代考据学者在考据研究中往往广搜资料作为证据,以求得比较信服的结论。

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采取本证和旁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诗经》古音进行考证。他极重证据,其引用的旁证材料极为繁富,有上古、两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陈及唐代的170余人的作品,还有歌谣、民谣、卜辞、碑文

等。他指出,之所以将考证《诗经》古音的证据采择如此庞大,主要是因为:“《左》、《周》、《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或谓三百篇,诗辞之祖,后有作者,规而韵之耳。不知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渐尽矣。唐宋名儒,博学好古,间用古韵,以炫异耀奇,则诚有之”。<sup>[25]</sup>如他考证“服”字古音时,除列举了十四条本证,又列举了大量先秦至汉魏的语言材料作为旁证,证明“服”古音为“逼”。<sup>[26]</sup>

方以智很注重博证,他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并与实际相结合,详加考辨。他说:“辨证,以史为本,旁及诸子百家;志书小说,难可尽信,然引以相参,自可证发。”他认识到证据的搜寻、材料的积累对于考据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帖,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sup>[27]</sup>他还注意利用社会上诸如方言等活着的材料作为考证的重要证据。他指出:“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sup>[28]</sup>

### (四) 注重学术规范的创建

在明代考据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也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

对于学术规范的创建,胡应麟、方以智贡献较大。胡应麟曾指出,对于前人及其学术成果,应该采取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读书大患,在好诋诮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第文字烟埃,纪籍渊藪,引用出处,时或参商;意义重轻,各有权度,加以鲁鱼亥豕,论谬万端。凡遇此类,当博稽典故,细绎旨归,统会殊文,厘正脱简,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见可也。今偶睹一斑,便为奇货,恐后视今,犹今视昔矣。”<sup>[29]</sup>

胡应麟还提出了关于学术规范的一些原则,他说:“昔人之说,有当于吾心,务着其出处而翫之;亡当于吾心,务审其是非而驳之。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尚论之极也。今明知其得,而掩为己有,未竟其失,而辄恣讥弹,丈夫不为,大雅当尔耶!”<sup>[30]</sup>这就是说引用他人的论点要注明出处,不能掩为己有,即反对学术观点上的抄袭。同时他还强调学术批评不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所谓“尚论”,就要“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

方以智总结了前人的学术批评,主张以平心、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待前人成果,对于学术规范的认识较为进步。其《通雅·序》云:“新都杨慎最博而苟取僻异,实未会通……澹园(焦竑)有功於新都,而晦伯(陈耀文)、元美(王世贞)、元端(胡应麟)驳之不遗余力。以今论之,当驳者多不能驳,驳又不尽

当。然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征，其功岂可没哉。<sup>〔31〕</sup>

他在《通雅·凡例》中还指出：“书必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sup>〔32〕</sup>在这里，方以智强调征引的资料也要注明出处，并指出这样做是有益于后人的研究，也是要达到不埋没前人的贡献之目的。

明代考据学家关于学术规范的理论 and 建设，对清人影响较大，清代学者多有所承袭，使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更趋于成熟。

## 二 明代考据学的局限和缺失

明代考据学正处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时期，在许多领域还只是刚刚起步，并受当时空疏学风的影响，因而显得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和弊端。

### （一）考据之琐屑、炫奇夸博

明代考据学者强调博证，但受当时学风的影响，不少学者过于卖弄博洽，为考证而考证，致使有时考据愈加繁琐、博杂。考据之好奇博杂，使明代考据学者花费了不少工夫，考证一些毫无意义学术价值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如一些考据学者由于好奇，热衷于搜集和考订奇闻异事，如杨慎著有《异鱼图赞》、《希姓录》等就是为猎奇而作。再如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著有《皇明奇事述》四卷，收录和考索了大量明朝的一些奇异之事，如父子同名、一母孕两状元、大臣复姓、大臣更名、明缙绅奇姓等等，不一而足。

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考究了许多奇闻僻事，如姓存名缺者、名在姓亡者、仙道姓名特异者等。他还撰有《二酉缀事》，其中卷上考文士之有力者、夫妇形貌相似者、妇人当兵者等诸多奇事、琐事，卷中考述了古书中的奇事，卷下则收考了鬼怪神异之事数十则。周婴在《后林》也考证了诸如解鸟语人者、妇人双名、男人双名等一些奇异之事，甚是无谓。

明代学者刻意考证奇事僻典，于考据学的研究和发展是毫无意义的。

除了具有好奇之弊病外，明代考据学者还有夸博这一通病。的确，讲究博学和博证是明代考据学的一大特色，但明代考据学者有时举证过滥，为考证某一问题而处心积虑的搜辑证据材料，时而十几条，时而几十条，而没有认真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简工作，比如考证敦字之音，焦竑举出有九音，方以智认为有十七音。再如关于苴字之音，杨慎考证为有十四音，周婴认为有数十音，方以智则以为有十七音。象这种

以炫博为目的的考据，在明代诸位考据学者身上，有很多表现，不胜枚举。这种风气实际上对考据工作是极其有害的。

### （二）资料引用的缺失

明代考据学者在考证中很注重用证据说话，因而大多颇注意引用材料，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 （1）引文不注所出

如杨慎在考据文献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引用时往往不注所出，现略举几例加以说明：荷条：“荷，芙蕖；又名芙蓉，其茎茄，其叶莲，其木密，其花为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药，药中薏。”<sup>〔33〕</sup>此为尔雅释草之文。“又名芙蓉。”是郭璞注文。青鸟司马启条：“青鸟，鸛鵒也，鸛鵒于立春鸣，立夏止。”<sup>〔34〕</sup>此为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文。“鸛鵒”，杜预注作“鸛鵒”。

焦竑在考据过程中同样具有引文多无所出之弊病。有时不够规范，以至涉嫌剽窃。清人对此就明确加以揭示：“多剿袭说部，没其所出，如‘周易举正’一条，乃洪迈《容斋随笔》语。‘秃节’一条，乃宋祁《笔记》语。‘开塞书’一条，乃晁公武《读书志》语。‘一钱’一条，乃师古伪《苏轼杜诗注》语。……如斯之类，不可缕数。”<sup>〔35〕</sup>这也是当时许多明代考据学者治学存在的毛病。林庆彰先生认为，“转引资料不明言，古人类皆有之。然以明代学者为烈，盖人人炫奇好博，有以致之也。”<sup>〔36〕</sup>

再以胡应麟为例，他在考证和研究中往往转引资料不注所出。如他在《四部正讹》引用《周氏涉笔》之处有三：辨《六韬》，辨《鸛冠子》，辨《燕丹子》。《周氏涉笔》为古今各种书目所没有著录，仅《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引用数条，所引用的各条均见《文献通考》。这应该是胡应麟没有注明是转引自何处。

#### （2）妄删引文

明代考据学者在引用材料时，还有一弊病，就是妄删引文，随意删改引文资料。这造成引文与原文极为不符。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考据学家在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

以杨慎为例，比如在《升庵外集》中有魏豹彭越条：引《史记》：“魏豹、彭越，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怀叛逆之意，……”<sup>〔37〕</sup>根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南面”句下应有“喋血乘胜，日有闻矣。”二句。再如七盘舞条，引乐府《晋杯盘舞歌》：“……天与日，终与一，右回左转不相失，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sup>〔38〕</sup>“右回”句下应有“箏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儿。”三句，杨慎妄删之。

方以智引文随意删略之处也很多，如《通雅》卷五“望衍”条，方以智引用《周礼》春官男巫之文：“男巫望衍，授号，冬堂赠，春招弭，以除疾病。”没有指出篇名，对原文作了删略。原文应该是“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

春招弭,以除疾病。<sup>[39]</sup>

### (3) 资料引用欠谨慎

明代一些考据学者对所引用的资料不加详考,而常常将伪书作为考据的依据。如陈耀文在驳杨慎的错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毛病,比如考证嫦娥,杨慎认为月中嫦娥之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实因常仪占月而误也。陈耀文反驳之:“归藏云:‘嫦娥奔月,是为月精。非始淮南也。’<sup>[40]</sup>嫦娥奔月之说,实始自《山海经》杨慎所说的是错误的,而陈耀文所引用的《归藏》乃是六朝伪书,可见陈耀文考证有失谨慎。

### (三) 论证疏误与轻率

明代学者在考证过程中,有时出现论证疏漏,造成讹误。

如胡应麟论证轻率而出现讹误的地方不少。他在《经籍会通》中引王应麟《困学纪闻》:“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sup>[41]</sup>可见胡应麟知道《孟子》有内外篇共十一篇。后他在论及《颜子》三卷中又说:“《孟子》史称七篇,明甚,而《汉志》十一篇,盖七字误分为二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道:“前已引《困学纪闻》称《孟子》外书四篇,以四合七,非十一而何?何隔两页而自相矛盾也?”<sup>[42]</sup>

再以焦竑为例,焦竑引用《史通·杂说篇》:“李陵《与苏武书》,观其文体,不类两汉,迁史编于李传中,斯为谬矣。”遂驳之曰:“今李传中并无其书,且陵书为齐、梁拟作,迁亦何从逆覩之乎?”<sup>[43]</sup>实际上刘知几《史通·杂说篇》原文是这样的:“李陵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两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sup>[44]</sup>焦竑没有详加考审,就妄加驳斥。

《焦氏笔乘续集》“木瓜”条:焦竑以为征之诗意,“乃以木为瓜、为桃、为李,如今所谓假果者,亦画饼土饭之义耳。”<sup>[45]</sup>古时有男女投果定情者,焦竑矜奇好异,认为是假果,显然是错误的。

明代考据学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但在整理、发掘、保存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对明代考据学,我们应进行客观的评价。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明代考据学家的孜孜考据精神和成就,清代考据之学就难以在百年之间而取得卓越旷世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44-156.

[2][18][19]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

1983:239,239-256,122.

[3]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6] 刘起紘.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11][22] 杨慎.升庵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万有文库):600-601,84,605.

[9] 杨慎.丹铅总录[A].永\*.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55册:445.

[10] 杨慎.升庵集[A].永\*.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70册:749.

[12][43][45] 焦竑.焦氏笔乘[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4,73,232.

[13] 焦竑.澹园集.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759-760.

[14] 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185.

[15][17][23][35][36][42] 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622,622,621,667,643.

[16] 周亮工.书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27.

[20] 周婴.扈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5-310.

[2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083.

[24] 顾起元.玉堂丛语序[A].焦竑.玉堂丛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26]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7][28][31][32][39] 方以智.通雅[A].永\*.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57册:33-34,5,4,4,163.

[29][30][41]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A].永\*.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86册:423,423,196.

[33][34][37][38] 杨慎.升庵外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14,10,9,9.

[40] 陈耀文.正杨[M].永\*.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56册:143-144.

[44] 刘知几著,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683.

作者简介:赵良宇(1971-),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学术史、近代社会史。